

【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闻一多

年谱长编 下卷

闻黎明
侯菊坤
◎ 编著

闻立雕
◎ 审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闻一多年谱长编

下卷

增订版

闻黎明 侯菊坤 编著

闻立雕 审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按年谱长编体例编写,客观、完整和系统地记录闻一多先生各个时期的生平历史。全书由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组成。谱前主要记录家世渊源,正谱包括家庭生活、求学经历、社会政治活动、文艺创作理论、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思想发展、个人情操、友朋交谊等,谱后记录闻一多殉难后,国内外的反响和查处过程以及各界人士的追悼、纪念活动等。本书以原始或直接资料为基本史料,广泛收集宣言、函电、演讲记录、听课笔记、时事答问、报刊报道、档案文献、友朋学生的回忆和日记等相关信息,并参考走访记录和信访复函等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年谱长编:全2卷/闻黎明,侯菊坤编著.
—增订本.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ISBN 978-7-313-08647-1

I. ①闻… II. ①闻… ②侯… III. ①闻一多
(1899~1946)—年谱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5996号

闻一多年谱长编(下卷)

——增订本

编 著:闻黎明 侯菊坤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960 mm 1/16

总 字 数:1190千字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08647-1/K

总定价(全2卷):350.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总 印 张:65.75 插页:12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61453770

一九三九年 四十一岁

一月一日，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同日，政论性刊物《今日评论》在昆明创刊，主编是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

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公布《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五月实施“精神总动员运动”。

五月十五日，《中央日报》昆明版创刊。

八月二十三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九月九日，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在重庆开幕，会上决议成立宪政期成会，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由此开始。

十月十日，我军湘北大捷，是为第一次长沙会战。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民主同盟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

一月四日 茅盾应邀出席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的座谈会。会上朱自清致词，茅盾作了“文艺问题的两面看法”（即光明与黑暗两面）的讲演。先生当亦到会。

一月十三日 与朱自清商谈大一学生课外读物。朱自清日记：“下午在闻家商谈大一学生课外读物事，定书名如下：《鲁迅全集》、《从文选集》、《茅盾选集》、《巴金选集》、《志摩选集》、《日出》、《塞上行》、《欧游杂记》、《蒋百里文》、《汉代学术史略》、《胡适文选》、《人生五大问题》、《诗与真》一集、《人物评述续编》。”（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二月十八日 四幕话剧《祖国》以为前方将士募集鞋袜义演名义，在光华街云瑞中学礼堂首次公演。演出前，先生早早来到剧场，带领同学安置布景、道具。

先生为该剧排练和演出做了许多工作，得到大家的高度赞扬。陈铨在《联大剧团筹演祖国的经过》中说：“谈到导演，我们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中国艺术界的老

将闻一多先生。闻先生自从《死水》出版,开创中国诗坛的新方向以后,一直到现在都埋头在作考据的工作。这一次居然肯答应出来帮忙。舞台面的设计,完全是闻先生一人的手笔,解决了导演第一步的困难。以后几次重要的排演,闻先生都现身参加,贡献许多最可贵的意见。假如这一次公演,能够有相当的成功,那么闻先生是我们第一个功臣。”(昆明《益世报》“联大剧团公演祖国专辑”,1939.2.18) 联大话剧团也说:“闻一多先生自动的答应担任舞台设计,虽然闻先生是那么忙,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晚上我们排口的时候他总是亲自莅场指示一切的,这次的舞台面是那么完美,合理,全是闻先生的力量,因为闻先生不仅是个诗人,还是一个画家。”(联大话剧团《敬谢赞助本团的人们》,昆明《益世报》“联大剧团公演祖国专辑”,1939.2.18)

先生设计的布景和灯光,给观众的印象尤为深刻。一位记者说:“舞台上最使人悦目的是那几幅好布景,这应该谢谢闻一多先生精心设计所陈列的家具和各种装饰,精致大方,配色亦极和谐。依记者说:这在昆明半年来的话剧表演中,是比较最使人感觉满意的。”(南江《联大剧团“祖国”美演出,全剧精彩百出,观众情绪紧张》,昆明《益世报》,1939.2.19) 一位观众也称《祖国》的布景是“诗人的布景”,说:“闻诗人设计的布景、电光,使每个观众满意,特别在色彩上,例如第一幕和第四幕,是同一地点,但是为了二幕是不同的场合,一是忠勇的场合用了黄色灯光,一是悲惨的结果,用蓝色,同时两种不同的色彩,也分别了日夜。”(心丁《致联大剧团一封公开信——观〈祖国〉演出后》,《云南日报》,1939.2.20) 朱自清在本月二十日日记中,也写到“舞台设计佳”。(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2页)

《祖国》演出原定二十二日结束,但每晚不到七时,所有的座票就全部售尽,以至有些观众要求站着看。为了满足观众愿望,联大剧团发出启事,决定续演三天。启事云:“敬启者,敝团为前线将士募集鞋袜公演《祖国》以来,多蒙各界赞助,今又蒙来函纷请续演。敝团盛情难却,决再加演三日,至本月二十五日止,票价照旧,深望爱国士女届时参加,共襄义举,俾福利前方将士,至为公感。”(《西南联大剧团续演祖国启事》,昆明《益世报》,1939.2.22)

《祖国》演出获得很大成功。重庆、上海等地也都登载了《祖国》演出的消息和剧照。

二月二十五日 《祖国》连续演出八天,胜利结束。结束后剧组人员曾举行聚餐庆贺成功,先生很是兴奋,“举杯邀大家共祝抗战早日胜利,并说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他就要剃去自己的飘然长髯”。(张定华《昆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联大剧团”》,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5辑,1985年出版)

二月二十六日 《宣传与艺术》发表于昆明《益世报》“星期评论”专栏。文中认

为目前的抗战宣传不得法，主张宣传工作要讲技巧，不能只是标语口号。这是先生到昆明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亦是先生在抗战初期发表的唯一一篇文艺评论，特录如下：

在抗战第二期开始时，蒋委员长曾以“政治重于军事”的方针昭示国人。政治所包甚广，但唤起并组织民众以期达到真正的全面抗战当然是其中最主要部分。最近开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议，委员长又提出精神动员的方案。举凡领袖所侧重各点，在理论上其重要性无庸申述，问题只在如何实施。实施的步骤当然首重宣传，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宣传不得法，起码是枉费精力，甚至徒然引起一些不需要的副作用。或者更严重的反作用。宣传之不可无技巧，犹之乎作战之不可无器械，器械出于科学，技巧基于艺术。

回顾抗战以来我们宣传的工作实在难令人满意。我们所有的宣传似乎大部分还不离口号标语，文字的宣传固然是放大的口号标语，即音乐图书戏剧各部门亦何莫非变相的口号标语？大致说来，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似乎只顾宣泄自己的感情，而不知道如何将它传达给别人，所以结果只有宣（或竟是喧）而无传，于是多数的宣传品便成为大家压惊壮胆的咒语符篆，数量尽管多，内容却不必追究了。总之，我们的宣传品徒有形式而缺乏内容，其原因则在做宣传工作的人热情有余，技巧不足。

首先在宣传工具的选择上，太重视文字，就是错误，须知文字根本是一种叙事与说理的工具，在感动的功能上，它须经过一段较迂缓的过程，因此它的效用便远不如音乐图书戏剧来得迅速而直捷。对于识字阶级，文字宣传的力量已经有限，何况我们绝大多数的民众是文盲，文字对他们，根本无效呢？既然我们宣传主要的对象是一般，尤其是农村的民众，而大部分宣传品的影响恰恰是达不到他们，这是何等严重的矛盾！便就现今已有的文字宣传而论，我们似乎将宣传的意义看得太窄点。符篆式的标语，对于知识稍高的人们，不久已是一种侮辱吗？关于抗战理论的文字，不已经成为“抗战八股”吗？报纸上的新闻，不是常常被认为“宣传”，意思说是假的吗？这些工作我们做得不少了，虽则其效果有多少毕竟是疑问。也许正如间谍工作是收入消息，这种宣传工作是放出消息，也许这是战时不可少，甚至极重要的工作，但这不是我所谓宣传。我所谓宣传，在文字方面，是态度光明而诚恳的文艺作品，在形式上它甚至可以与抗战无大关系，但实际能激发我们敌忾同仇的情绪，它的手段不是说服而是感动，是燃烧，——它必须是一件艺术作品。这类的文字，就我

个人所知道的而论,除了几篇委实可歌可泣的报告文学(战地通讯)之外,似乎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东西了。但是我们胜任的作家应当不少,他们都藏到那里去了?

不过真正能读懂一篇文艺作品的人究竟太少,在我们特殊情形之下,文字宣传究不如那“不落言诠”的音乐图书戏剧等来得有效。

在情绪传播的迅速上,音乐是再好没有的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正大可为。过去在这方面的成绩总算比较令人满意,但仍欠普及,欠深入。最近我看过一个戏团的公演,在最末一幕终了时,几个游击队正在和敌人苦撑,青天白日旗忽然从山后飘扬起来,随着一阵救亡歌曲的声音,援军到了,幕下了,幕后歌声仍然不断,并且愈加激荡了,想必舞台上全体人员都加入了。这时我满以为台下全体观众也会响应起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多么伟大!全堂六七百人一齐怒吼起来,那点经验的教育作用,不要胜过千百篇痛哭流涕或激昂慷慨的论说或演讲吗?

然而幕下了,台下一阵喧哗,散戏了。我急得直跺脚。这是我们音乐宣传不够普及与深入的一个实例。

讲到图书,也许最令人伤心。办了一二十年艺术教育,到如今没有几个人能够画出一个人体,不带上许多解剖学的错误。

大师们追着这派那派西洋潮流效颦,却有始终不会使木炭在张白纸上老实研究过一个人体的。结果徒弟们相习成风,在漫画木刻里勉强描个似是而非的人模样,加上一个标题,就算是画了。就抗战以后我曾到过的武汉、长沙、贵阳、昆明四个都市讲,我就从未见过一幅像样的宣传画。特别在长沙,你走过一条街,往两旁墙壁上一望,不啻是做着一场噩梦。在武昌街上我倒发现过一幅在人体上还站得住的宣传画,但那作意真别扭得可以。我亲耳听见一群乡下人聚在画前发议论,原来把画中的意义整个弄反了。

同类的情形若发生在戏剧里,结果可就严重了。听说某处开伤兵慰劳会,演了一出话剧,伤兵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把演员打了。平情而论,抗战以来,戏剧真够努力的了。可惜的是愈努力愈感觉“剧本荒”。把仅有的剧本,一堆堆的口号,勉强搬上台,导演者十九又不能尽其责。在这剧作家与导演家两头不得力的苦境之中,真辜负了不少的好演员。

要晓得上述各种工作,除了那与间谍工作异曲同工的文字宣传是由政府主持的,其他则差不多全是人民自动的工作。在此情形之下,人力不能集中与夫财力不济,往往使工作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是应该原谅的。说政府知道了

宣传的重要，但何以对宣传工作进行的方法这样大意，而把最有效的部分丢着不管呢？诚然像这次抗战在我们历史上是第一次，所谓发动整个民族力量的全面抗战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对这种抗战的技术我们完全不娴习，但是现成的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借镜呢？难道我们真依然是八股脑筋，只知道舞文弄墨的宣传才是宣传，而别的全不认识吗？我要问后方工作究竟是否至少与前方工作同样重要？若然，这样松懈，这样低劣的宣传就可了事吗？时机迫切了，不赶紧想办法，还谈什么最后胜利？其实这点工作，只要政府真正推行起来，并不甚难。把一切胜任的人才动员起来（现在有的是在西洋受过很好训练的艺术专门人才闲着没有事做），组织起来，发一笔在整个国家预算中微乎其微的款子，就中一部分可以用来购置一点新式设备（如制版、印刷设备、舞台的灯光设备等等），再斟酌各部门的需要，无妨向国外聘请些专家来作顾问导师。在军事上可以“楚材晋用”，在文化上何尝不可如此？这般大规模的干起来，才配得上称宣传，不，以前狭义的“宣传”二字还不能包括上述的计划。这是在“精神动员”工作中增加“精神食粮”的大量生产计划。

这不只是抗战工作，同时也是建国工作。在筑铁路、设工厂的物质建国时，我们别忘了也要精神建国。让我们在抗战的宣传工作中，奠定建国大业中艺术生活、精神生活的基础。

二月二十八日 寒假结束。新学期里先生讲授“离骚”。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寒假后，开始讲‘离骚’。他仍着重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证，对于诗人屈原其人类似当代名伶的看法也提出来了，但未详细论述。这时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上似同意一种‘疑古’的观点，即初读《离骚》的人，如果不看王逸的旧注，就很难懂得屈原是怎样一种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64页）

三月五日 作《西南采风录·序》。收《闻一多全集》。

《西南采风录》是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长沙至昆明长途旅行中，在大量采集民间歌谣基础上，编成的一部诗歌集，收入情歌、童谣、抗战歌谣、采茶歌、民怨、杂类六类民歌共七百七十一首。先生是湘黔滇旅行团的导师之一，所以刘兆吉请先生写序。先生在序中既介绍了该书的材料收集和编撰经过，也表现出他自己的抗战决心：

正在去年这时候，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敬佩。现在这些

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惭愧对这部分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未尽力,但事后却对它发生了极大兴趣。一年以来,总想下番功夫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但因种种关系,终未实行。这回书将出版,答应刘君作序,本拟将个人对这材料的意见先详尽的写出来,作为整理工作的开端,结果又一再因事耽延,不能实现。这实在不但对不起刘君,也辜负了这宝贵材料。然而我读过这些歌谣,曾发生一个极大感想,在当前这时期,却不能不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个地面上混下去了。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至于胜利,那是多么泄气的事,胜利到了手,不是搏斗的愉快也得终止,“快刀”又得“生黄锈”了吗?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脸斯文人”!

《西南采风录》迟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还有朱自清、黄钰生所作的序。刘兆吉在“弁言”中写到:“我要谢谢几位师长和好友:黄子坚、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许骏斋(维通)五位师长,除了多方指导外,或赐序文,或题书面。”

三月十二日 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刊载署名“昔心”的《昆明的几位作家》,文中介绍到先生时说:“去年三月,西南联大步行团来滇,闻亦多先生,便是旅行团的指导人,他同一群青年人,越山过岭,走了三千多里。他每天总是要走几十公里,从没有过倦容。这种精神,实在是令人敬佩的。闻亦多先生是诗人,又是艺术家,他现在西南联大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并且领导学生演话剧。最近轰动了昆明市的《祖国》公演,演戏的是联大的学生,而内部的指导,便是闻亦多先生,所以处处都博得观众的好评。记者于《祖国》公演时,便中会见了闻先生,他说:来昆

明,很少做诗,上课之余,间或为《益世报》写点星期论文,大多是艺术方面的文章。闻先生真是一位忠实于艺术的人,这次联大剧团,公演了一个星期,他每天在会场指导至夜静三更时,始离开会场。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位长须老人,他和一群青年人,始终在一块活跃,在一块热烈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为提高民众抗战的意识,为前方将士募捐,在抗战的后方确实是最切要。不久闻亦多先生,将同西南联大剧团还要下乡演剧,他还要利用戏剧的力量,使民众明了敌人的残暴,敌人的野心,这是乡村中最需要的。”

三月十四日 《璞堂杂记》发表于迁至昆明的《益世报》副刊“读书”第一一三期。收《闻一多全集》时名为《璞堂杂识》。这是对《周易》和金文中若干文字的考释与训诂。

三月二十七日 先生倡议之庞熏琴西洋画展览会开幕,地点在原为日本领事馆的罗念生家。(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17页)

三月三十日 黄钰生、梁宗岱、吴宓、皮名举来访。《吴宓日记》云诸人于午饭后“同入城,访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于小西门内福寿巷三号寓宅,久谈”。梁宗岱“述其经行各省之所闻见,及其仗义行侠之事”,“谓当局用人不公,误国甚大,拟撰《反求诸己》文若干篇,以畅言之”。(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7册,第14页,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

四月二十九日 清华大学借云南大学礼堂,举行建校二十八周年纪念大会,到者七百余人。校长梅贻琦因公在河内,所以由潘光旦代表校长致辞。云南大学校长、前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也讲了话。大家一致希望明年校庆能在清华园内举行。

五月四日 朱自清日记云:“参加国民宣誓仪式后作中国文学史报告,并谈了中文系助教人选问题。樊谓一多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让杨遇夫回来。杨颇保守,而我们保留几个空额也是明智之举。我不想固执己见,但对一多的做法颇感不快。他应事先与我商议。下午访一多,在杨的问题上同意他的意见。然后,我坦率地要求他若有什么主张,首先应与我商量,他对我表示抱歉并赞赏我的意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2至23页)先生有时自作主张,容易引起朱自清的不快,十九日,朱与罗常培、杨振声商谈大一国文事时,也说到这件事,甚至说自己的学术地位“低得可怜”。(同前,第25页)

五月二十八日 朱自清来访。朱自清日记:“访闻一多。他谈了古代诗与史的两传统理论。”(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26页)

六月一日 作《歌与诗》。发表于十五日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第十六

期。收《闻一多全集》。题下注云：“这是计划中的一部《中国上古文学史讲稿》的一章。”这时，先生正在试图解决中国上古时代是否像西方那样，也有一部史诗的问题。本文即探讨之一。文章分三节。第一节述歌的起源，云：

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有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那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这样界乎音乐与语言之间的一声“啊~~~~”便是歌的起源。不错，“歌”就是“啊”，二者皆从可陪声，古音大概是没有分别的。……严格的讲，只有带这类感叹虚字的句子，及由同样句子组成的篇章，才合乎最原始的歌的性质，因为，按句法发展的程序说，带感叹字的句子，应当是由那感叹字滋长出来的。……实字之增加是歌者对于情绪的自觉之表现。感叹字是情绪的发泄，实字是情绪的形容、分析与解释。前者是冲动的，后者是理智的。由冲动的发泄情绪，到理智的形容、分析、解释情绪，歌者是由主观转入了客观的地位。……感叹字确乎是歌的核心与原动力，而感叹字本身则是情绪的发泄，那么歌的本质是抒情的，也就是必然的结论了。

第二节述诗的功能和诗与歌的区别：

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诗之产生本在有文字以前，当时专凭记忆口耳相传。诗之有韵及整齐的句法，不都是为着便于记诵吗？……文字产生以后，则用文字记载以代记忆，故记忆之记又孳乳为记载之记。……一切记载既皆谓之志，而韵文产生又必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语）的了。……“歌”的本质是抒情的，现在我们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诗与歌根本不同之点，这来就完全明白了。再进一步的揭露二者之间的对垒性，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诗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在散文产生之后，它与那三种仅在体裁上有有韵与无韵之分，在散文未产生之前，连这点分别也没有。……诗即史。当然史官也就是“诗人”。

第三节述诗与歌的合流：

社会日趋复杂，为配合新的环境，人们在许多使用文字的途径上，不得不舍弃以往那“繁于文采”的诗的形式而力求经济，于是散文应运而生。史的记载不见得是首先放弃那旧日的奢侈驯习的，但它终于放弃了。大概就在这时，

志诗二字的用途才分家。一方面有旧式的韵文史,一方面又有新兴的散文史,名称随形式的蕃衍而分化,习惯便派定韵文史为“诗”,散文史为“志”了。此后,二字混用通用的现象不是没有,但那只算得暂时的权变,和意外的出轨。……韵文并非式微,它是迁移到另一地带去了。他与歌有一段宿诺。在记事的课题上,他打头就不感真实兴趣。所以时时盼着散文的来到,以便卸下这份责任,去与歌合作,现在正好如愿以偿了。……诗与歌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结果乃是“三百篇”的诞生。一部最脍炙人口的《国风》与《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

《歌与诗》“大体上是凭着一两字的训诂,试测了一次‘三百篇’以前诗歌发展的大势”,先生说:“‘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最后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知道诗当初即是史,那恼人的问题‘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也许就有解决的希望。”

在剪贴发表后的《歌与诗》时,先生又附上了“排比句法”、“韵”、“连环句法”、“系数”等类的史料多条,可能打算进一步补充。

六月十四日 上午,决定先生与朱自清、罗庸、魏建功四人担任云南省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讲师。(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1页)

是年,云南省教育厅继续开办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并根据全省实际需要,将教育部规定的三组训练科目增加为国文公民、史地、数理化、英文四组,规定全省各公私立中等学校每校至少选送三人受训。西南联大对这次暑讲会给予大力支持,先生再次担任暑讲会讲师。七月三日,在教育厅召集的联席会议上,决定暑讲会的时间从上年的四个星期延长至六个星期,每个星期组织一次精神讲话,三次学术演讲,两次时事讲话。此外,分组讨论每周三次,分组演讲每周三次,分组分科演讲每周六次,体育每周四次,个别讨论每周二次。同时,推定的各组召集人,其中朱自清为国文组召集人,江泽涵、黄子卿为数理化组召集人,叶公超为英语组召集人。(《教厅举办二十八年度中学教师暑讲讨论会,科目分国文史地理化英文四组,聘专家讲学内设教务事务二部》,《云南日报》,1939.6.21;《教厅举办中等教师暑讲会昨开联席会,各组讲师已聘定,报到学校三十八校九十九人》,《云南日报》,1939.7.4)这次暑讲会于七月十七日开学,至二十九日,报到学员共一百五十四人,约占全省中等学校教师总数的七分之二。(《暑讲会昨开讲,龚厅长出席精神训话》,《云南日报》,1939.7.18;《暑期教师讲习会昨举行开会礼》,昆明《益世报》,1939.7.30)

下午,出席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会议,听张清常、马约翰、沈有鼎三人各自所谱之校歌曲谱演唱。三十日再开会,确定用张清常之谱,并向常委会呈报。七月十一

日,常委会通过,并备文向教育部呈报。

六月十五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请求休假研究:

月涵先生校长钧鉴:迳启者:二十六年在平时,一多适届休假期间,曾依国内研究条例呈请休假一年,并由系中特聘助理员一人襄助研究。比蒙评议会全案通过,准予施行。适值故都沦陷,学校迁湘上课,时系中教师颇感缺乏,遂承主任朱佩弦先生命暂缓休假回校授课,计又两年于兹矣。顷者奉到校中通知国内休假研究办法下学年度行将恢复,用特呈请依照上述二十六年所拟研究计划重予核准,俾便施行。惟是前次所定研究题目系编纂《诗经字典》,兹因书籍缺乏关系,该项工作不易进行,爰将研究题目改为“中国上古文学史”,缘本系新定课程中本有“中国上古文学史”一门,虽早经指定由一多担任,而迄今未能开班,诚以此类新创课目,内容较为复杂,即收集材料已非咄嗟可办,遑论整理。此次倘得休假一年,以全副精力从事准备,则不特久缺之课程得以早日开班,即一多个人年来在此方面研究所得,亦可藉以告一段落,俾早日勒成专书,以供献于社会,公私两便,幸何如之。至助理员之薪金,在前次计划中原定为四十元,以目前生活程度衡之,自不免过薄,此次倘能依照大学毕业生待遇标准,酌予提高,尤所企祷。以上所请各节,统希裁夺,不胜待命之至。肃此。敬候钧安。闻一多,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教师申请休假出国或在国内研究的来往函件》,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十七日,清华大学迁昆明后第三次评议会会议议决:“闻一多教授拟具计划请求在国内休假研究案。通过。并由校供给研究助理一人,月薪五十元至八十元。”(《评议会会议记录与部分提案》,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六月十七日 清华大学召开迁昆明后第二次聘任委员会会议,议决续聘先生与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据《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与部分材料》,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月初 有信致曹禺,今佚。信中有句话说:“现在应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还说演出《原野》就是要斗争要反抗,表示自己要为该剧做舞台美术设计。(据田本相《曹禺传》,第25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又一力作,它描写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农民所处的万分痛苦、想反抗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情况,全剧围绕有杀父夺地之恨的仇虎,要复仇的强烈冲突心理,深刻地反映了伦理道德、封建迷信观念对人性的摧残和吞噬。《原野》首次演出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当时未曾引起轰动,一九三八年春,已迁至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准备公演该剧时,当局还下令禁演。但是,先

生很看重《原野》，与凤子、吴铁翼（国立艺专校长）联名电请曹禺来昆亲导《原野》，承办单位为昆明国防剧社。

此事经过，时任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第二科科长，主管宣传的李济五回忆：“有一天，凤子和孙毓棠到《民国日报》社来找我：‘你主持的国防剧社底子厚，有经费、有人力，为了很好地开展话剧活动，为抗日多吃一些宣传工作，我们可以请万家宝（曹禺）来昆导演几场话剧。’我很惊讶地问凤子：‘当真吗？你们确有把握把万先生请来吗？’凤子说：‘怎么没有把握？我们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如果你同意，只要以我和闻一多、吴铁翼（国立艺专校长）三人的名义写信给他，他就会来的。’我听后大为高兴，回答她说：‘那就太好了，但这件事我个人不能决定，必须请示上面再告诉你们。’于是我立刻向龙秉灵（龙云的表弟，时任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长，国防剧社属其所辖）作了汇报。龙秉灵本来对话剧没有多大兴趣，但曹禺是闻名已久的剧作家，他听了我的汇报便马上答应，至于经费问题，以后再说。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凤子，先由她和闻一多、吴铁翼联名打电报给曹禺，同时由国防剧社正式发出邀请电报，并汇去了从重庆到昆明的飞机票款。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初的事。”（《忆国防剧社》，《春城戏剧》1986年第1期；访问李济五记录，1987.11.8）

十日，曹禺复电接受邀请。十三日，曹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自重庆抵昆明，宿西南大旅社。

七月十四日 龙秉灵设宴为曹禺洗尘，先生与凤子、孙毓棠、李济五等人作陪。随后商定演出剧目两种，一为《原野》，一为老舍、宋之的等集体创作的多幕抗日话剧《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

七月十六日 曹禺搬至华山南路的南京旅社，距凤子、孙毓棠住的青云街洋槐巷四号很近。大家常在凤子家中商量有关演出的问题，决定《原野》由曹禺亲导，孙毓棠任舞台监督，先生和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雷圭元分任舞台设计和服装设计。演员方面，凤子饰金子，李文伟饰焦大星，汪雨饰仇虎，樊筠饰焦大妈，孙毓棠饰常五爷，黄实饰白傻子。

先生为了《原野》演出，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他全神贯注昼夜不停地思考琢磨。在家里，他找了几个装美孚石油桶的木箱，放倒当作舞台，又用硬纸壳制作了各种样式各种颜色的布景、人物的模型，在“舞台”上摆来摆去，调上调下，时而以某几种颜色或样式相配，时而又另选几种颜色或样式相配，时而伏在近处仔细端详，时而又退到几尺以外评头品足，不时还回头征求夫人孩子的意见，如此这般斟酌比较，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才选定一个最佳方案。

李济五也回忆说：“闻一多先生是分工负责舞台美术设计的，雷圭元先生是负

责服装设计的,但他们两位并不分彼此,随时密切合作,雷先生住在左哨街,闻一多经常去雷的住所研究服装设计的问题。他们在研究《原野》剧中人物的服装时,反复琢磨仇虎的性格特征,决定仇虎穿的衣服应该是黑缎红里的短袍。金子的服装,应该是大袖口镶黑边的粉红色姊妹装。决定以后,还带着几个联大剧社的同学到商店选购衣料,陪着演员到服装店量尺寸,按规定缝制。在舞台美术设计上,闻一多先生有一天到孙毓棠家里同曹禺、风子在一起研究《原野》的布景和道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设计焦大妈家里的桌椅,曹禺说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和剧中人物的性格后,闻一多思索了许久……,用手比划着说,焦大妈堂屋里的桌子必须给人以 massiveness(即沉甸甸的意思)的感觉,曹禺表示完全同意。《原野》每一幕的舞台设置他都与曹禺共同研究,绘出平面图后,先制成模型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经过多次修改,才正式投入制作。舞台布景是他根据剧情先绘成小样,然后才正式绘制。我原来只知道闻一多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在曹禺来昆后在孙毓棠家中同他商量演出事宜时,他拿出一大叠写生画给我们看,画的都是联大从长沙迁昆途经湘西沅陵、辰溪等地时的风景,这时我才了解到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写生画家。在筹备演出《原野》时,他在绘制布景上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美术才能,而且显示出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制作布景的地点是在三转弯的岑公祠内空地上。有一天下午我前往看望,闻先生正在撩起长袍,蹲在地上生炉子熬胶水,面前铺着一大张布,旁边摆着绘油画用的各色颜料。我看了很不过意,劝他休息,我替他熬胶。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动手绘布景。就这样,每绘一张布景,就要花一两天的功夫。《黑字二十八》的布景有的是他自己设计并亲手绘制的,有的是他指导艺专的同学制作。”(《春城剧戏》,1986年第1期;访问李济五记录,1987.11.8)

剧中担任主角“金子”的风子,在《哭闻一多先生》一文中回忆到:“为了《原野》的演出,闻先生自告奋勇担任服装设计。‘金子’着的一件紧身红棉袄,还是他自己去跑估衣铺买了来的。仇虎的那件大褂,他坚持要黑缎面子,红缎里。我们只知道他是位学者,是位诗人,却不知道他也是位画家。对于着色,对于情调的把握,他有高人一等的鉴别力。《原野》舞台上的一部分的成就,我们忘不了在那些日子里闻先生赐予的协助。”(《人民英烈》,第169页)

小华(何孝达)在《闻一多先生的画像》中亦说:“仇虎在森林中的那一幕,他用了许多黑色的长条的木板在台的后半,一排排大小错综地排列起来,叫人提了小红灯笼,穿来穿去,在台下看起来就显得这片森林多么幽黑深远。”(《自由文丛》之二,第16页)

排练中,先生对剧情曾提出过一些建议。余冠英在《谈〈原野〉》中认为“金子同

意杀大星是不近情的”，说先生也赞成他的看法。“闻一多先生主张将剧情略为修改，为花、焦两家造出一段仇隙来，使焦阎王爱上金子的母亲（互恋单恋均可），使金子的父亲因此而死于焦手，焦阎王必欲得金子为儿妇因此得一解释，焦大妈之痛恶金子也增加了理由。不过这件事金子丝毫不知，焦大妈知之而不详，但仇虎却尽知底细。仇虎告诉了金子（或再由常五证实一下），使金子对焦家生了得分之念，于是同意仇虎杀大星而不复顾惜。这样一改可解决许多问题，委实是可取的办法。”

余冠英还认为“第三幕（即最后一幕）亦颇成问题。作者使仇虎的精神发生剧变，以至在林中屡见幻象，事前的准备不够。换句话说，仇虎这种变态没有充分理由解释”。关于此点，余亦说：“闻先生对此解决的办法是改小黑子为金子所生，而事实上是仇虎的种子，但只有金子心里明白。小黑子的死为仇虎一手安排，金子不与闻。在孩子死后金子才伤心地说出真象，于是仇虎悔恨发狂。”余认为，“这样较为可通，不过仍欠深刻，且时间上亦难安排（倘剧情如此，仇虎与金子别离后的时间便该很短了），尚未为圆满的办法。”（《今日评论》第2卷第13期，1939.9.17）先生对《原野》剧情的修改意见，朱自清在《〈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一文中曾有记述，余冠英之文，则对先生的意见做了进一步介绍。

同日 下午六时，赴云南服务社，参加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国防剧社举行的欢迎曹禺茶会，出席者为昆明市剧界名流以及新闻界等十余人。茶会由龙秉灵任主席，先生与楚图南、陈豫源在会上发言。（《昨国防剧社欢迎曹禺》，昆明《益世报》，1939.7.17）

七月二十一日 致在成都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李小缘信。未入集。信云：

小缘吾兄左右：奉到七月十七日手札并拙稿副本，顷以校阅一过。第四页两“渔猎”，请将原稿代为改正，余悉仍旧此本。五年前旧稿，南来后略加补充，久储篋衍，今承贵校学报代为发表问世，曷胜感纫。长沙古物之发现，为近来考古界一大事，又经锡永先生整理，其价值之大更不待言。《闻见记》想不日即可颁到，弟治楚辞多年，凡楚国文物尤宿所留意，将来得读此书，定能获益不浅也。谨预拜赐并讫代向锡永先生致其钦仰之忱。敝校（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朱佩弦本年休假，系务由弟暂代，将其全力于研究所。贵所章程及工作计划倘蒙惠赐一份，用资借镜，无任铭感，弟不日即当迁回昆明，赐示仍寄昆明敝校可也。端此敬覆藉颂着祺。弟一多拜上。七月廿一日。（徐雁平《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七月二十五日 文协昆明分会主办的暑期讲习班开课，为期两个月。楚图南、

冯素陶、彭惠、施蛰存、朱自清、徐炳昶、顾颉刚、张天虚、徐嘉瑞、杨东明、穆木天、马子华、曹禺先后讲演。先生也曾主讲过一次。

七月二十八日 张清常完成有五个乐章的《敬献西南联合大学》，将歌词和曲谱主旋律用简谱油印出来，寄给先生，首页上写：“谨呈佩弦、一多师恳乞赐正。”（据影印原件，清华大学校史馆藏）

八月十六日 曹禺第一次亲导的《原野》在昆明新滇大戏院正式公演。先生特为演出撰写了《说明书》。（据访问吴征镒记录，1986.7.25）《说明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剧“蕴蓄着莽苍浑厚的诗情，原始人爱欲仇恨与生命中有一种单纯真挚的如泰山如洪流所撼不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当今萎靡的中国人恐怕是最需要的吧！”（转引自李乔《看了〈原野〉以后》，《云南日报》，1939.8.23）

《原野》起初演出了九天，虽时正逢连日大雨，但仍天天满座。《黑字二十八》演了五天时，应各界要求，又再演《原野》五天，直到九月十七日方结束。两剧共演三十一场，全城轰动。朱自清在《〈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中说：“这两个戏先后在新滇大戏院演出，每晚满座，看这两个戏差不多成了昆明社会的时尚，不去看好像短了些什么似的。……这两个戏的演出确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的一件大事。”（昆明《今日评论》第2卷第12期，1939.9.10）

演出期间，先生陪曹禺游西山，逛华亭寺，在温泉洗澡，回来拍了一大堆照片。

演出结束后，除去各种开销，尚有剩余，每人分了一些。先生也分得四百元。（据访问李济五记录，1987.11.8）

九月一日 德国法西斯军队大规模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先生对国际局势的变化极为关注，天天急着看报。

九月四日 朱自清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文学学院院长冯友兰信中，说到先生休假研究，推荐刘云樵为其助理。信中云：“闻一多先生本年度休假研究，评议会许其聘用助理一人。闻先生兹推荐刘云樵君为助理。刘君系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生，曾在南洋群岛任教。查其资历，尚属相合，月薪拟定为六十元整，从九月份起薪。此事曾向芝生先生面商，应承同意，谨再缮函奉达。”（《文学院各学系教师异动的来往文书》，清华大学档案室藏）

七日，梅贻琦批示：“照办”。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先生休假研究期间，刘云樵并未担任助理工作。

是年度，先生聘书注明月薪仍为四百元。

九月上旬 开始休假，为期一年。一九三九年度，清华大学恢复教授休假在国内研究之办法，首批安排先生、赵凤喈、王力、张印堂、冯景兰五教授休假研究。